

徐堅，《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442頁。

《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以下簡稱《暗流》）一書是在晚近更豐富、更系統的田野發掘、研究和多維向度的學術史情境中重新釐定1949年之前的安陽之外的考古學發現與闡釋，揭示出1949年之前的中國考古學呈現為多來源、多環節、多線索的多元圖景。這是中國考古學史多元寫作的首次嘗試。

《暗流》一書的價值，不僅在於揭示中國近現代考古學史的多元圖景，而且更是對考古學史寫作方式的反思。之所以採用「暗流」的視角，據作者所言，這是對單綫式進化主義的考古學史寫作方式的反思，是從一元視角向多元視角的範式轉變。《暗流》一書有着強烈的考古學理論傾向。作者曾譯介了情境考古學代表人物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代表性著作《閱讀過去》(*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和「作為思想史的考古學史」的範式寫作的布魯斯·崔格爾(Bruce G. Trigger)的《考古學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二者奠定了本書的理論來源。

作者分別從三個標準來釐定暗流傳統：第一，人員和機構；第二，科學與非科學之分；第三，實證與理論之別。三個標準之間不是涇渭分明，而是有着諸多重疊之處。從本書的篇章結構來看，在緒論、餘論之外，共分為九章。人員和機構的討論分散在第一至五章、第八章，科學與非科學之分的討論集中在第六至七章，實證與理論之別的討論是在第九章。

第一、二章考察的是史語所之外的安陽和曾參與安陽的田野發掘，但又在其他的田野發掘活動中形成了有別於安陽傳統的學人。在第一章中，作者指出史語所的安陽不是安陽的全景。在史語所之外，安陽至少仍存在三個方面的內容：地方學術力量的考古發掘；私掘和流通等非學術活動；日本機構和學人的發掘。這三條線索最終能夠實現資料性回訪的僅有盜掘這一條線索。作者利用「轉型文本」即黃濬的《鄆中片羽》和梅原末治的《河南安陽遺寶》來實現對安陽的物質回訪。在物質回訪中，作者採用了「加減法」，一方面更準確地定位安陽的考古學內涵，另一方面將非安陽的器物或者晚期的器物剔除出去。這一物質回訪的「加減法」也見於後文對新鄭彝器、洛陽金村等個案的分析。第二章以郭寶鈞、吳金鼎為例，探討二者在安陽之外的

貢獻。郭寶鈞參與了浚縣辛村、汲縣山彪鎮、輝縣琉璃閣三地的田野發掘，建立了商周墓葬的術語和描述方式，總結墓葬空間的陳器制度、開啓了墓葬規格與墓主人社會身份等級之間的對應關係的潮流。吳金鼎的蒼洱境調查和發掘的貢獻在於不僅證實了西南史前時代遺址的存在，而且吳金鼎建立了中國考古學史上第一個複雜的陶器文化編年體系。

第三章考察的是安陽之外的眾多的考古學組織，包括了博物館、大學、研究機構和獨立的學術團體。作者選取了雲南博物館、黃花考古學院、考古學社為例，探討三者對考古的不同理解。作者對雲南博物館的分析，得益於柯蒂爾(Georges Cordier)兩次訪問雲南博物館的記載。作者通過對雲南博物館的器物的選擇的分析，認為雲南博物館正是考古學缺位的典範。黃花考古學院先後組織了貓兒崗漢墓、東山廟寺貝底的朝漢臺磚瓦遺址等的發掘。貓兒崗與在此之前發掘的龜崗大墓成為構建南越國考古學的起點。作者從空間、形態和物質文化三個方面重新定位了龜崗、貓兒崗的考古學內涵，認為二者年代不同，是分屬於不同階級的墓葬，二者不應捆綁在統一的「南越國考古學」之下。作者進一步討論物證觀下的歷史考古學存在的問題，呼籲回歸到考古學視野之下的歷史考古學。考古學社集中體現了在田野考古之外，以金石學和器物學為主流的學術團體謀求考古學認同的焦慮。

第四章以張希魯為中心，討論傳統金石學類別之一的朱提堂狼洗如何經由張希魯之手，恢復了它的考古學內涵，並成為構建滇東考古學的關鍵一環。張希魯確定了朱提堂狼洗的出土環境是梁堆，是首位將滇東地區的遺物與遺迹現象有意識聯繫在一起的學人。與吳金鼎的「國族主義」視野之下的蒼洱境的調查和田野發掘形成對照，朱提堂狼洗和梁堆成為張希魯構建鄉土史的關鍵材料。

第五章是以器物類別為中心的討論，即銅鼓研究。銅鼓研究，構成了早期考古學史的具有人類學與民族學傾向的考古學類型。作者對前範式的銅鼓研究的討論集中在鳥居龍藏、鄭師許、凌純聲、聞宥四人。在現有的銅鼓的認知水平下，作者進而對公佈的四筆銅鼓資料進行評估，對銅鼓的類型、年代、出處作出判斷。鳥居龍藏開啓了銅鼓之中的民族考古學研究思路，之後的諸位銅鼓研究學者反而回歸到博物館收藏的器物學模式。但作者同時指出鳥居龍藏的銅鼓研究存在着連續類比和斷裂類比的問題。

第六章、第七章討論的是考古學史上的盜掘現象。第六章以新鄭彝器為例，第七章以洛陽金村和長沙楚墓為例。三者都曾遭受到盜掘，但盜掘之後的情形有別。新鄭彝器遭受盜掘之後，在軍方的強烈干預之下，轉變成為

「考古學之前的考古學」的範例。作為物質回訪的新鄭李家樓的鏡像：蘄雲鶴《新鄭出土古器圖說》、關百益《鄭冢古器圖說》、《新鄭古器圖錄》和孫海波《新鄭彝器》，仍未脫離於金石學圖錄之外。而歷來對新鄭李家樓器物的研究集中在帶有銘文的王子嬰次爐和形態以及紋飾特殊的器物，以特定歷史事件解釋考古學器物組合，並將新鄭李家樓定位為「鄭公大墓」。作者通過對新鄭李家樓的物質分析和空間分析，認為新鄭李家樓大墓可以界定為最高等級的精英大墓，但未必是鄭公。作者進而討論從物質走向歷史的方法論問題。而洛陽金村、長沙楚墓的個案則是說明學人如何通過古物流通市場恢復盜掘器物的考古學價值。在第七章金村的個案中，作者主要採用物質分析的「加減法」，將晚於東周的器物或者年代在東周，卻來自其他地區的器物從懷履光《洛陽故城古墓考》和梅原末治《洛陽金村古墓聚英》所界定的「金村器群」中剔除出去。而在長沙楚墓的個案中，與金村不同的是，作為回訪線索的三家著作：柯強《長沙古物展覽》、商承祚《長沙古物聞見記》及續記、蔡季襄《晚周繪書考證》都有着田野傾向。因此，相對於金村的物質回訪的「減法」，長沙楚墓的物質回訪中，「加法」更為常見，三家公佈的器物大多得到同類器物的證實。作者在對長沙楚墓的分析中，注意到長沙楚墓發掘過程中一個群體——「土夫」以及「土夫」在墓葬辨識方面的貢獻。

第八章以崖墓研究為例，討論有着不同學科傳統的中外學者在同一主題的研究呈現出多線索的格局。作者選取了其中的四條線索：鳥居龍藏、貝德祿、謝閣蘭，到陶然士的西方視角，商承祚的器物學傳統，代表了田野考古學傳統的吳金鼎、曾昭燏和夏鼐。鳥居龍藏是崖墓調查和研究的開創者，第一次提出蠻子洞就是墓葬。這一觀點現已廣為接受，但在崖墓來源問題上，不同學人之間形成了西來說和漢人說的觀點。作者進而從地理分佈、空間結構、器物組合三方面對以上四條線索進行物質回訪，揭示了西來說和漢人說背後的理論預設，並指出這種「由物及人」的單一對應關係是傳統的文化—歷史主義考古學的假設。

考古學不是發現之學，田野發掘也不是考古學的全部。第九章討論考古學概念、方法和理論入華問題。作者分別討論了考古學基礎知識、考古學的兩個基本方法：類型學和地層學入華的過程，指出雖然三者的源頭都是西方，但實際上三者都受到作為中介的日本考古學的影響，更為準確地講，是受到「日本考古學之父」濱田耕作的影響。但濱田耕作的影響不見於安陽傳統，卻影響了1949年之後的中國考古學。

在餘論，作者進一步指出，所謂的「暗流」視角，就是後過程主義考古學。後過程主義考古學視野下的考古學是「作為歷史學的考古學」，這一歷史學傾向的考古學與歷史—文化主義的考古學截然有別。

如作者所言，暗流視角不能採用例證法來研究。《暗流》一書所選取的個案，既有出於資料發現的偶然性，又有基於作者自身的學術興趣和學科傳統。這一切都構成了中國考古學的多元圖景。暗流是一種視角，是對單綫式進化主義寫作的反思，提倡多元的寫作，最終揚棄主流和暗流之分。《暗流》一書涉及範圍之廣、理論深度的分析，都是當下中國考古學史寫作中無出其右的。

劉芝華  
中山大學歷史系

**沈海梅，《中間地帶：西南中國的社會性別、族性與認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466頁。**

商務印書館新近出版了雲南學者沈海梅著《中間地帶：西南中國的社會性別、族性與認同》。在書中作者強調，「雲南不應當再是文化中心主義下的邊緣，而是中國內地與東南亞之間的聯結地，也是西藏和東南亞之間的聯結地。」（頁16）因而，雲南一直是多種文化交匯、多重關係疊加的中間地帶。在這一論述基礎上，作者從三個相對集中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基地出發，為我們呈現了這本「關於西南中國少數民族的社會性別民族誌」。作為近期有關中國西南研究、特別是雲南研究的歷史和人類學方面的最新成果，隨着時間的推移，該書對國內西南邊疆及少數民族研究的影響也將逐步浮現出來。

作為最先讀到該書的讀者之一，先將書的結構介紹一下。該書分導論、上編「一個傣族社區中的社會性別文化建構體系——對西雙版納曼底寨傣泐村寨的社會性別考察」、中編「社會性別在彝族社會——來自雲南永仁直苴羅羅潑彝族村寨的個案」、下編「大理海東、海西的文化差異——白族社會族群認同的內部邊界與性別表述」及結語四個部份。上編又分為導言和四章，暫且將其分為「性別表述」、「性別生態」、「性別與族群關係及其現代性背景」及「宗教實踐中的性別關係」四個部份；中編以繆格勒(Erik